

田
野
與
文
獻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文獻搜集與解讀

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信仰的短暫因緣

· 張雪松

《陳君葆日記全集》人物訂誤一則

· 梁偉基

一則有關鴉片戰爭的廣東地方文獻——凌府墓志碑考

· 閔曉青

清代景德鎮的惜字會——景德鎮寧紹惜字會碑介紹

· 劉朝暉

活動消息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成員單位：

中山大學歷史系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廈門大學歷史系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

編輯委員會：馬木池、張兆和、陳春聲、程美寶、廖迪生、劉志偉、蔡志祥

執行編輯：黃永豪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季刊） 第四十八期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五日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 印製

ISSN: 1990-9020

通訊地址：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Editorial Office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電子郵箱(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Web Site): <http://schina.ust.hk>

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信仰的短暫因緣

張雪松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民間信仰與正統佛教的關係，從晚清開始，直至今日，無論對學者還是信徒，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佛教改革者，常常批評以印光法師為代表的法師，印送各種宣揚因果報應的善書的行為是迷信。但是直到現在，許多人信佛，還是始於對善書的閱讀。

本文通過挖掘二十世紀上半葉，廣州生產五加皮酒的著名酒廠永利威的老闆及其手下一批人，在印光法師的感染下，由香港黃大仙信仰逐漸轉入專修淨土信仰的歷史事件，試圖討論民間信仰與正統佛教的關係，以求證於方家。

引言：印光法師與民間信仰

對於近現代中國的佛教研究，學界的焦點常是圍繞在幾個主要課題上，例如：推崇楊仁山、歐陽竟無在法相與唯識學上的研究成果；關注1910年代廟產興學衝擊後，中國佛教會等全國性組織出現的意義；探討乙太虛大師為核心的佛教革新運動……即：「佛教在思想理論上、組織結構上、社會活動形式上都開始向現代宗教轉化」。類似這種佛教的宗教「現代化」或「世俗化」論述，成為近現代佛教研究的主流。然而這種傾向，卻有研究取徑（approach）窄化的隱憂，當我們愈去強調佛教向「現代宗教」轉化，就愈會去忽略，甚至是撇清佛教和傳統民間社會信仰的關係。¹

上述范純武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近代佛教與民間教派的關係可能遠比我們想像的要深入得多，例如筆者在對民國淨土宗十三祖印

光法師的研究中就發現，解放初「寧夏佛法外道」據不精確的估計達七八萬之多，他們佔據寺院一百八十一處，表面信仰淨土，尊印光法師為師，暗中卻以羅蔚群為八祖，奉五部六冊為『龍經』²。

明清以來以禪宗為代表的中國漢地佛教宗派構建，類似於傳統社會中的宗族。但晚清民國以來，「封建大家庭」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弊端，也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攻擊，中國佛教在宗派組織建設上同樣面臨這樣的危機。在太虛法師領導「新式」的僧團制度改革的同時，中國傳統的「淨土宗」也為緩解這種危急提出了自己的辦法。

所謂中國淨土宗，既沒有一般基督教教會的科層（Bureaucracy）組織，也沒有法牒世系傳承，不存在以禪宗為代表的中國傳統佛教宗派那種類似「宗族」（Lineage）式建構。因此，並不存在一個實體性的「中國淨土宗」這樣的組織團體或譜系傳承。正因為「中國淨土宗」的這一特點，為中國佛教宗派突破宗族體制提供了一種選擇的可能；特別是那些不能夠被編進「神聖家族」、正統僧人譜系中的民間信仰者，可以通過念佛而獲得中國淨土宗的身份，從而成為「正統」。可以說正是淨土宗構成了正統出家僧人佛教、與普通信眾之間的仲介，將普通民俗信仰，聯繫到正統佛教上，得到正統佛教的認可。

由於上述原因，相對其他佛教宗派，近代中國「淨土宗」與民間信仰有著更加密切的關係。民國時期的印光法師，利用近代日益便利的交通、郵政系統，以書信、廣告、印送善書等各種通訊手段，與全國乃至東南亞等海外華人居住地區的淨土信仰者有著廣泛的聯繫，而他本人也成為中國淨土宗的「法人代表」。他與中國民間信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1) 印光法師與民間信仰的互動關係，最為引人注意的是他與善書的密切關係，正如游子安指出：「如果說近世『善書運動』由17世紀初的袁黃、株宏揭開序幕，再而普及民間，那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福壽寶藏》、《善書大辭典》諸書的出版，翼化堂等善書局推動善書流通，及印光的倡印善書，則標誌著『善書運動』達到了一個高峰。」³拙作〈積極入世的印光法師〉⁴一文，主要是從社會史角度來探討印光法師印送善書活動。

在印光法師與善書的關係中，我們可以看出，印光法師是堅守正統佛教本位的。民國初年以前，印光法師「執理甚嚴」，並不許人看善書，後來改變對善書的看法，大力推廣善書，但還是將善書的位置放在佛教經典之下。據著名佛教居士鄭頌英回憶：「先族叔祖玉田先生，前在普陀理藥業十餘年，親近印公也有十餘年之多。他曾經對我說過……大師的安置經書，始終是有條不紊。大乘經論居上，小乘經論次之，善書又次之，從無零亂雜置的。」⁵大體來講，印光法師印行善書，是以正統佛教的標準進行選擇和刪改的。對於辟佛，特別是誹謗淨土信仰的善書，他是極力反對的。印光法師對善書的選擇，在一般信徒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三十年代有人依據《印光法師文鈔》中反對《慧命經》和《仙佛合宗》的言論，來指責翼化堂主辦的《揚善半月刊》提倡此兩種善書，從而激起《揚善》主編陳撻甯的強烈不滿：「彼印光法師之權威，且不足以支配教內之佛學書局，如何能支配教外之翼化堂，豈非咄咄怪事。」⁶主編過《海潮音》雜誌，後來出佛入道的張化聲則認為「竊以為（陳撻甯）神經亦太敏矣」「印光乃一狹隘的念佛僧耳。佛教兩雄，太虛與歐陽竟無之言論，彼此尚罵為魔說，況他教哉。不如是，不成為印光也。」⁷張化聲的這個評論很有意思，似乎不批評人，「不成為印光也」，從中也可以看出印光對於善書自始至終是「執理甚嚴」的。

但印光法師也有受善書影響或者同善書合拍的一面，如印光法師書寫皆加句讀，難字加注解，多次批判他人的書寫難以辨認（如對早年弘

一法師書法的批判）；再如對破血湖的批判，認為女子月經、生產本是天經地義之事，並不污穢等等，與近代廣為流行的善書《玉曆寶抄》的看法⁸都非常吻合。

(2) 印光法師與扶乩的關係，是其與民間信仰互動的另一重要表現。民國初年，諦閑法師在北京講經，「白城隍」在北京西城琉璃胡同錢宅降壇，將諦閑法師請去求教經意，其間又有關帝和周（倉）將軍降壇向諦閑法師求教。⁹此事在北京轟動一時，後出版《顯感利冥錄》。印光法師雖然對「諦公已證聖果，關帝尚未明心」的傳言不以為然，但對此次扶乩還是頗為相信的，並大加褒獎。¹⁰

大體來言，印光法師認為扶乩多為靈鬼所為¹¹，不是真佛、菩薩降壇，故扶乩觀善、募化則好，若談佛理、教理則多謬誤，故多不喜人扶乩，晚年甚至不惜與社會名流江易園反目。

下面將以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信仰的短暫因緣為例，簡單探討一下印光法師與扶乩信仰團體的關係。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扶乩的關係，陳劍鏗在他的博士論文中略有提及¹²，而史實部分討論較多的是范純武和游子安¹³，筆者將在下節「從黃大仙到哆哆菩薩」中予以詳細的梳理；又印光法師西逝後，有一顆舍利被請到香港，曾存放在本是黃大仙扶乩場所的「半春園」達十多年之久，此事學界較少論及，筆者將在「從半春園到東林念佛堂」一節中予以介紹。以上兩節主要作史實部分的討論，而最後在「結論」中，嘗試對印光法師與扶乩的關係進行理論分析，以其拋磚引玉，就教於方家。

從黃大仙到哆哆菩薩

黃大仙信仰團體之一，哆哆佛學社的創辦者，曾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主動聯繫過印光法師，現存史料主要有兩處，一是1933年印光法師〈覆江景春居士書二〉：

民國初年，香港有扶乩者，言其仙為黃赤松大仙，看病極靈。有絕無生理之人，求彼仙示一方，其藥，亦隨便

說一種不關緊之東西，即可痊癒。黃筱偉羨之，去學，得其法而扶，其乩不動。別人問之，令念金剛經若干遍再扶。依之行，遂亦甚靈。因常開示念佛法門，偉等即欲建念佛道場，云，尚須三年後辦。三年後，彼等四五人來上海請經書，次年來皈依，遂立哆哆佛學社，以念佛章程寄來。念佛後，觀音勢至後，加一哆哆訶菩薩。光問，何得加此名號。彼遂敘其來歷，謂前所云黃赤松大仙，後教修淨土法門，至末後顯本，謂是哆哆訶菩薩，且誠其永不許扶乩。此二事，因一弟子輯淨土法語，名淨土輯要，光令將前二事附之於後。今為汝寄三本，閱之，可以自知。（哆哆訶菩薩，光令另為立一殿供養，不可加入念佛儀規中，免致起人閑議。）¹⁴

二是1929年仲秋出版的《淨土輯要》¹⁵附錄〈覺明妙行菩薩及哆哆娑婆訶菩薩應化事蹟〉：

戊辰仲冬一夕，慧圓于太平寺侍本師印公座前。本師以黃德煒居士所書哆哆娑婆訶菩薩應化事實見示。誦悉之餘，不勝讚歎。因請附印於淨土輯要之後，以廣流傳。本師曰：「此事與覺明妙行菩薩降化吳地相同，是宜約撮兩事，附之書後，以見菩薩宏揚淨土之悲心；而扶乩者多為靈鬼假託。不可語於佛法也。」慧圓受命而退，因錄其大要於後。己巳二月初八日邵慧圓謹志。

哆哆娑婆訶菩薩應化事蹟的介紹，依據黃德煒居士上印公法師書：「弟子回憶自少棄儒習賈，距今計有廿餘年。此時賓士於馬巫來半島，及美洲各國各埠。凡有永利威貨到之處，幾無不親歷其境……因此對於仙佛之說，概不暇研究。」「迨至五年前，有友人在本港供奉黃赤松

大仙。工餘扶乩問事及治病，無一不靈驗異常。嘗邀弟子前往參觀，迨蒞壇，見各人求病問事，均默稟壇前，大仙無一毫錯答，各如所求而退，心覺奇異。」後黃德煒之子，及一友人，均得黃大仙扶乩而治癒，從此信服，並「發願自行扶乩，更深信仰」。念《心經》一月後，乩動成文，「有問即答，極為詳明，並囑每日誦《金剛經》、《大悲咒》、《明聖經》等經，定為常課，並印送《太上感應篇》等善書。」「乩語多是發揮善惡，千言萬語，瞬即寫畢」，並將壇中所得詩集成一冊《風波浪詩集》。「數月後某夕，乩忽寫出同人中篤信者之名，囑令到港永利威四樓，大仙明白告各同人云：現今世界，人心沉淪之極，世風日下之時，非佛法無以挽救。今值汝等正篤信佛法，故明白告汝等（指弟子等）云云。吾實哆哆娑婆訶菩薩，汝等自後直力向佛學做去，不宜做仙壇事。佛本無乩壇之設，應立刻即將乩壇撤收，以符實行佛法宗旨。若再以乩問事，則大背佛道。余因汝等根機劣陋，非以靈驗事顯於目前，不足導汝等之篤信。故姑且扶乩代言，作入門之法徑。但令汝等明白，自後切勿再扶乩，或至出險事。何也？因到壇者，多不是正名仙神，均皆冒名入壇居多，即停止扶乩之念，至切至切，自後以《金剛經》、《大悲咒》兩種作常課。並現非辦佛事時候，再候三年，則可自悟自謀，提倡念佛，乃其時也。云云。」黃德煒等人後便停止扶乩，到與印光法師通信時，自稱「停止已四年矣。現組織佛學社，各同人皆前者最篤信之道友。由去年至今，已符三年之期，因組織此社。以符實行學佛之表示，冀藉此得遇大知識，闡揚佛法，自利利他。」

《文鈔》中存有印光法師的回復：

手書備悉。哆哆菩薩所示，可謂真實之極。覺明妙行菩薩，與哆哆菩薩，如出一轍。足見扶乩之不可依據。菩薩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即此可見一斑。哆哆菩薩既有大恩，實不可忘，然亦不宜加入念佛儀中。念佛儀，雖文殊普

賢地藏彌勒尚不加入，況其他乎。然此等菩薩，同攝清淨大海眾菩薩中。若加入哆哆菩薩，在本社固無所礙，然他處不知，反招疑議。但宜另供一處，朝夕禮拜即已。¹⁶

又印光法師〈覆海門理聽濤書七〉「其三」中提到：「明末，覺明妙行菩薩，以乩開導佛法，臨去令其永斷扶乩。十年前，香港哆哆佛學社，亦然。此二，皆真菩薩，而禁止扶乩。以無甚道力之靈鬼亂說，誤人實深，故菩薩即以扶乩，而禁絕扶乩。」¹⁷此七封信的首頁，有「民國二十一年」（1932）字樣，范純武由此認定「哆哆佛學社，成立約在民國十年（1921）左右」。¹⁸但大光法師則在《香港佛教發展史》一文中提到：

同年（1928）秋天，九龍方面成立了「哆哆佛學社」，此社專門傳授淨土念佛，社址在九龍蒲崗村的曾富花園，這是清末以來，香港佛教中弘揚淨土宗的所在，以念佛為宗旨。該社初創時，社友只有數十人，於每週六、日兩天集合念佛，星期日晚上則設「瑜伽焰口」（救孤魂野鬼的一種超度儀式），使冥界能普遍的往生。此外，社內並設閱經、靜修、蔬食、放生等四部。¹⁹

游子安據此提出哆哆佛學社成立於1928年。筆者以為，哆哆佛學社成立於1928年秋的说法，比較可信。理由如下：

（1）根據前引《淨土輯要》附錄邵慧圓的記敘，印光法師是在民國戊辰仲冬，即1928年年底，向他提到香港黃德煒居士寫信成立佛學社的，因此黃德煒是在1928年年底之前給印光法師的書信，其信中說，扶乩「停止已四年矣。現組織佛學社……由去年至今，已符三年之期」。由此筆者推測，黃德煒是1924年前後²⁰，因小兒及友人病癒而信仰黃大仙，參加扶乩活動，扶乩活

動前後不足一年便停止，1925-1927三年未進行扶乩活動，三年期滿，1927年黃德煒等四五人前往上海請佛經，並同印光法師取得聯繫，「次年來皈依，遂立哆哆佛學社」，因此大光法師記述香港哆哆佛學社成立於1928年秋是可信的，哆哆佛學社秋季成立後，將章程郵寄給印光法師，印光法師見其中有「哆哆菩薩」故復函詢問，黃德煒再復信回答。印光法師在當年年底，將此事告於邵慧圓居士，並令其將這段經過附錄在《淨土輯要》中。《淨土輯要》1929年秋出版6,000本，書後〈助印淨土輯要功德芳名〉中有「無名氏，一千本；黃德煒、常，各五百本……聶雲台二百本」等字樣。

（2）印光法師《覆海門理聽濤書七》信前所記1932年，恐為首次通信時間；又現存〈覆理濤居士書一〉及〈書二〉，即是〈覆海門理聽濤書七〉中的其五、其六（後人編輯重複），〈書一〉、〈書二〉的落款時間分別是「癸酉（1933）九月」和「甲戌（1934）二月」²¹。由此可見〈覆海門理聽濤書七〉「其三」是寫於1933年九月之前，則十年之前，則是1923-1924年，印光法師所謂「以乩開導佛法，臨去令其永斷扶乩。十年前，香港哆哆佛學社，亦然」，是指十年前哆哆菩薩以乩開導佛法，臨去令其永斷扶乩，而此後四年，哆哆佛學社才成立。故此說哆哆佛學社成立於1928年秋，與印光法師信中所言並不矛盾。

另外，寬仁法師在《香港佛教面面觀》一文中的記敘，與大光法師的說法相同：

1928年秋天，九龍成立了哆哆佛學社，專門弘揚淨土念佛法門，社址在九龍蒲崗村的曾富花園，這是清末以來香港佛教中弘揚淨土宗的所在，以持名念佛為宗旨。社內並設閱經、靜修、蔬食、放生等四部。²²

從半春園到東林念佛堂

哆哆佛學社的創立者黃德煒居士，即是在民國三年（1914）創辦廣州永利威酒莊的黃筱煒，

永利威是中國近代重要的釀酒企業，它生產的五加皮酒馳名中外。《印光法師自述》：「至民十七年（1928）有廣東皈依弟子擬請往香港，離普陀，暫住上海太平寺。十八年春擬去，以印書事未果。」²³《自述》中的「廣東皈依弟子」即指黃德煒，陳劍黃先生綜合印光法師各種傳記材料文獻，指出：1928年「香港弟子黃筱偉（德煒）等數人，特建精舍，欲迎印光赴港，印光也答應前往。可是真達和尚一再勸留，認為江浙佛地，信徒尤多，不可驟然離去。」²⁴黃德煒請印光法師去香港的原因和動機，我們將在下節討論。

黃德煒雖然在印光法師生前沒有將其請到香港，但印光法師西逝後，黃德煒請得一顆舍利到香港，現存記錄這件事情始末的史料主要有三條：

1960年德森法師在蘇州靈岩山寺，為香港東林念佛堂作〈印光法師紀念堂碑記〉：

（印光法師）示寂舍利鮮明，不久香港黃德煒居士，托友人向妙真和尚請得一顆，供於半春園者約十年，未遂其建塔之願，竟辭塵世。又經年餘，盧君雅、馬寬廣、林俠菴、石純富諸居士等，商妥定西、茂蕊二位法主，向黃耀蓀先生說允，由聖懷法師、盧、石二居士，將老人舍利及袍帽等，迎至東林念佛堂，適逢大勢至菩薩聖誕良辰，亦云妙矣。²⁵

定西法師〈籌建蓮宗十三祖印光法師紀念堂舍利塔〉：

十年前黃筱煒居士請來紫色舍利一顆，擬在大埔半春園建塔供養，事未果成，居士西歸。其夫人羅少珍與侄黃耀蓀居士，及港九善信，擬集資建堂立塔，同種福田。已商妥香港新界荃灣芙蓉山東林念佛堂主事人定西、茂蕊二師，指定在大殿正右，不日即行動工。師之舍利則巧于本年農曆七

月十三日，乃大勢至菩薩聖誕良辰請至東林矣。²⁶

定西法師〈印光大師紀念堂舍利塔落成報告經過〉：

本港黃德煒居士，托友人周禎瑞君，請得舍利一粒，及袍帽鞋襪各一件，臨時供奉在大埔半春園，擬求名山勝地，建堂紀念，以資垂範。事為馬寬廣、盧智頌、石純福居士等所聞，建議請至荃灣東林念佛堂，興建紀念堂與舍利塔，當即得到黃德煒夫人及令侄耀蓀先生贊許，並承黃夫人慨捐一千元，以為首倡……幸蒙各護法居士，人力財力，經二年之久，始克落成，工料費計需陸萬元之譜。²⁷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印光法師火化後得舍利子千餘，「妙真上人以六聚舍利，攝影分贈知識。遠近見者，莫不歎為稀有；至有發心迎請供養，永作紀念者。」²⁸由上面所引三條史料可以得知，香港黃德煒居士，托友人周禎瑞，向靈岩山寺當家妙真法師請得印光法師舍利一粒，及袍帽鞋襪各一件，供奉在香港大埔半春園。半春園是黃氏家族產業，「半春園初建於1930年代，原為故紳黃德煒居士擁有，當年黃居士經常聯絡兩位友人，定期遊園半天，交流佛學，誦經拜佛。因為他們三人常有此半天遊園之約，園子便得名『半春園』」²⁹。五十年代初，半春園大興土木，可能此時黃德煒本擬建舍利塔，但未果而西逝；印光法師舍利因此供奉在大埔半春園十多年，後由馬寬廣等居士撮合，得到黃德煒夫人黃羅少珍及侄子黃耀蓀先生同意，將印光法師舍利從半春園請至荃灣東林念佛堂，開始著手興建紀念堂與舍利塔，黃夫人慨捐一千元作為首倡。而印光法師舍利的接受者定西，屬於天臺宗諦閑、倭虛法派，日本侵華時期，曾長期擔任哈爾濱極樂寺住持，原名如光，日本投降後他南下，改名定西。³⁰

定西《印光大師塔久未批准，動工無期有

感》詩中有「下筆先談污吏囊」等句，可見印光法師舍利塔的批准興建並不是十分順利。1960年十一月初一，印光法師紀念堂舍利塔落成，舍利入塔安放。當日，黃柏溪居士所拍攝的題為「香港印光大師舍利安奉攝影」的照片，照片中突現一隻僧足，信眾多以為「至誠感應，以如是因緣，故得印公大師光臨示現」。³¹

這則神奇故事，所起到的現實功能，是讓信眾堅信印光法師已經踏「足」東林念佛堂，就此在舍利塔中落戶。由此，印光法師徹底離開了黃氏大埔半春園，從二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末，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信仰、哆哆佛學社和大埔半春園的關係，就此告一段落。從1960年至今，已將近半個世紀，往事塵封，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的這段因緣，也逐漸為人淡忘。

結論：自利利他

永利威酒行老闆黃德煒在信仰黃大仙扶乩後，為何會突然皈依印光法師，成立哆哆佛學社，甚至可能要將印光法師請到香港來。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先看1933年所立的《黃大仙齋色園規則》。該規則供十七條，齋色園對「所錄同人」的各項要求和管理是十分嚴格的，捐獻等各種義務要求也很多，特別是第八條：「各同人欲自建築靜室者，要先呈請仙師批准，不得任意自為。一經建築之後，即作本園公有」云云。³²這些規矩雖然是三十年代初最終定型，但早前應該也有雛形。

我們從前引黃德煒給印光法師的信中，已經得知，黃德煒是自行扶乩請黃大仙臨壇的。而黃德煒在給印光法師信中所說：1924、1925年間，最終放棄扶乩，將黃大仙說成其實是哆哆菩薩，所選地點也頗引人注意，是「（香）港永利威四樓」，似有意同齋色園黃大仙祠區別開來，而其區別的方式正是通過佛教。而且1925年是黃德煒（黃筱煒）最後一次見於黃大仙董事名錄中「協理：黃筱煒先生（揮覺）」，「一九二五年（乙丑）四月啓建第三屆萬善緣法會二十一天，並附薦先靈，黃筱煒道長投得正薦。」³³

而後齋色園似也要加強和鞏固自身的權威，

如1926年〈羅漢尊者乩文〉：「丙寅冬月期日，羅漢尊者降鸞書出戒定會三字，訓令達通（引者按：「通」恐為「道」字）達其意，伸覺伸其詞。……本壇弟子韋達道、何伸覺敬誌」。³⁴戒定會為佛教三學，羅漢尊者將佛學解釋的權威賦予了齋色園弟子韋達道和何伸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後，齋色園崇佛活動亦不少，可參見前述游子安〈粵港地區黃大仙信仰中的三教融合〉一文中相關部分討論。

面對這種情況，永利威黃德煒欲借佛教脫離齋色園的控制，則必須在齋色園扶乩之外，找到一個更加被人認可的佛教權威。所以黃德煒在黃大仙轉變為哆哆菩薩後，最終找到了淨土宗著名僧人印光法師，或許計劃將其請來香港未果；但成為印光法師皈依弟子，成立哆哆佛學社（1928年秋），又出版印光法師鑒定的載有哆哆菩薩事蹟的《淨土輯要》（1929年秋），便足以保證其信仰的正統性和合理性。³⁵

故此，1930年黃德煒等十多人，終於退出齋色園普宜壇，在大埔建「半春園」。當然這種借助正統佛教（淨土宗）名義，跟齋色園黃大仙信仰的分離，主要是組織管理上的，似未完全脫離黃大仙扶乩信仰，游子安指出，有些道侶往來於齋色園和半春園之間，並據梁本澤撰《金華風貌》卷三（未刊），「籌建半春園者譚榮光、李亦梅，兩人直至1948年還任齋色園協理。」

如此來看，印光法師似乎是被人「利用」了，筆者以為其實也大可不必這樣理解。哆哆佛學社，與眾多各色淨土組織社團或個人，請印光法師題詞，寫傳記等等，並無根本的區別，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縮影，都是起到一個讓正統佛教的代表印光法師「鑒定」的作用。雖然一度存放印光法師舍利的半春園，一直沒有根除印光法師所反對的扶乩，但五十年代擴建後的半春園，外表基本上是佛教寺院規制，大雄寶殿供奉著在江蘇精刻的西方三聖，應該說印光法師所宣導的淨土信仰，影響是十分明顯的。若沒有這個信仰黃大仙的扶乩團體的作用，應該講今天香港也不會有「淨土真宗」³⁶印光大師紀念堂和紀念塔了³⁷，而哆哆菩薩的故事，也為正統淨土信仰增加

了一個扶乩不可信的實例。³⁸ 應該說，印光法師與哆哆佛學社是互利雙贏的。

印光法師要求黃德煒將哆哆菩薩「另為立一殿供養」，現在半春園內大雄寶殿供奉著西方三聖，這樣實際上是印光法師對標準（化）淨土信仰的推行，也是對地方信仰的一種至少是表面上、名義上的「收編」。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扶乩的這段因緣，再次證明瞭近代淨土宗作為正統佛教與民間信仰之間仲介作用的功能。

註釋

¹ 范純武，〈近現代中國佛教與扶乩〉，《圓光佛學學報》，第3期（1999年2月），頁262。

² 〈三年來的寧夏佛教〉，《現代佛學》，1953年，第6期，頁32。

³ 游子安，《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82。

⁴ 張雪松，〈積極入世的印光法師〉，年輕佛教學者學術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辦，2006年。

⁵ 鄭頌英，〈紀念印公說到尊經惜字〉，原刊於《弘化月刊》，第7期（1942年1月），頁10；見李銳鋒主編，《鄭頌英居士紀念文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2），頁98。

⁶ 〈本社覆函〉，胡海牙編著，《陳撈甯先師研究系列之仙學輯要》，上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頁364-365。

⁷ 張化聲，〈覆陳撈甯先生惠函〉，《陳撈甯先師研究系列之仙學輯要》，上冊，頁371。

⁸ 如《玉曆寶抄》：「即敘所議各項字句，逐細圈斷，毋庸裝點更改，可使世間男婦，易能知曉」；「血污池置設殿後之左，陽世誤聞僧尼所說，皆因婦人生產有罪，死後入此污池，謬之甚矣。」

⁹ 見倭虛，《影塵回憶錄》（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頁55-57。

¹⁰ 見〈與四明觀宗寺根祺師書〉，張育英校注，《印光法師文鈔》，上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頁14。

¹¹ 此觀點曾遭陳撈甯、胡海牙師徒嘲笑，事見《陳

撈甯先師研究系列之仙學輯要》。

¹² 陳劍鏗，《印光（1861-1940）研究》（香港：香港大學未刊博士論文，1999年），頁271-272。該論文修改後已經出版，見陳劍鏗，《圓通證道：印光的淨土啓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

¹³ 游子安，〈粵港地區黃大仙信仰中的三教融合〉，宗教的和平與衝突學術會議，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與北京大學宗教學系合辦，2005年。

¹⁴ 《印光法師文鈔》上冊，頁334。

¹⁵ 潘慧純、邵慧圓參訂，印光法師鑒定，《淨土輯要》，1929年，上海陳家浜太平寺、長沙佛經流通處藏。

¹⁶ 〈覆黃德煒居士書〉，《印光法師文鈔》，中冊，頁937。

¹⁷ 見《印光法師文鈔》，上冊，頁364。

¹⁸ 〈近現代中國佛教與扶乩〉，頁282。

¹⁹ 見《大光老和尚圓寂兩周年紀念》，San Francisco: LIN DU TEMPLE；香港：千華蓮社，1999年，頁15-16。

²⁰ 香港黃大仙齋色園也是在1924年，於九龍西貢道首創藥局，贈醫藥。

²¹ 見《印光法師文鈔》，中冊，頁756。

²² 寬仁，〈香港佛教面面觀〉，《五臺山研究》，1998年，第1期，頁42。

²³ 見《印光法師文鈔》，上冊，頁4。

²⁴ 《圓通證道：印光的淨土啓化》，頁34。

²⁵ 東林念佛堂董事會，《東林小志》（香港：東林念佛堂，1963），頁30。

²⁶ 《定西大師語錄》，載《西齊淨土詩、定西大師語錄合刊》（香港：東林念佛堂，1972），頁47。

²⁷ 《東林小志》，頁37-38。

²⁸ 范古農，〈印光大師舍利記〉，陳海量編，《印光大師永思集》（上海：上海書店，1991〔據弘化社1941年版影印〕），頁32。

²⁹ 余從，〈三人半天漫遊：半春園〉，《溫暖人間》，第201期（2007年5月3日），頁14。該文作者的父親與黃德煒是表親，當年常去半春園遊

玩。

- ³⁰ 如光，在大陸被視為漢奸，參見高丕琨，〈如光其人〉，孫邦主編，《偽滿社會》（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頁585-588。在香港，則對定西（如光）在東北的歷史比較避諱，如明觀〈為定西老法師發龕法語〉，便隻字不提他在哈爾濱極樂寺的經歷：定西「至二四（1935年）年，經浙江普陀山法雨寺達圓和尚，授具足大戒。戒期圓滿，參訪名山，親近高賢，學習台宗，信生淨土，建立古寺，創辦佛學，接引後昆。至一九四九年，與倓老法師，樂果法師，受居士請，轉來香江，設華南學佛院，擔任主講，首屆學僧畢業後，開創東林，繼續廬山遠公蓮社，專弘淨土」云云。（明觀和尚遺著，釋靈真編校，《夢華集》〔香港：佛教光明講堂，1971〕，頁37。）
- ³¹ 參見〈舍利奉安，影現僧足〉及〈附錄來函二則〉，《東林小志》，頁45-46。
- ³² 科大衛等編，《香港碑銘彙編》，第二冊（香港：市政局，1986），頁514。又據游子安主編，《香江顯跡：齋色園歷史與黃大仙信仰》（香港：齋色園，2006），頁56。影印原本，做對照，略有勘正，這處勘正由游子安向筆者指出，另外游對筆者論文指正良多，不勝感激。
- ³³ 伍永根編，《齋色園》（香港：齋色園，1991），頁138、52。「揮覺」是黃筱煒的道號。
- ³⁴ 《香港碑銘彙編》，第二冊，頁600-601。該書將此文列入年代不詳，但齋色園民國後方成立，

民國丙寅年為1926年無疑。

- ³⁵ 《淨土輯要》助印者中，聶雲台是前上海總商會會長，曾國藩的外孫；而「無名氏」可能就是印光法師本人。從現存書信來看，印光法師曾多次出錢幫助邵慧圓出版善書，印光法師手頭似也有不少《淨土輯要》，如他曾把《輯要》送江景春三本，且《輯要》在上海的版藏地就是印光法師的居所。
- ³⁶ 香港東林念佛堂印祖舍利塔上，有定西法師所書「淨土正宗」四個大字。
- ³⁷ 1963年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首次訪港，即前往印光大師舍利塔前頂禮瞻仰，「這一位淨土第十三代宗師的舍利塔，在一棟屋宇內。屋裏香花撲鼻，莊嚴肅默；文明上香、獻花，頂禮後繞塔三匝，然後默然離去。」（星雲，《海天遊蹤》〔臺北：覺世旬刊社，1964〕，頁477。）
- ³⁸ 印光法師認為扶乩不可信，皆是靈鬼所為，與其相信哆哆菩薩降壇，其實不像陳劍鏗在《印光法師研究》中所講的，前後矛盾。因為印光法師認為，哆哆菩薩這類真菩薩降壇，最終會像《西方確指》中的覺明妙行菩薩那樣，降壇是為了告誡人們扶乩不可信，要轉而念佛求生淨土，並且不會再降壇；所以相信哆哆菩薩降壇，與否定扶乩，並不存在邏輯矛盾。而印光法師相信關公降壇向諦閑法師問法，是因為當時社會迷信扶乩，而僧人社會地位低下，印光法師認為關公降壇向諦閑法師問法，關帝意在抬高僧人的社會地位。

《陳君葆日記全集》人物訂誤一則

梁偉基

香港中華書局編輯出版部

前言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周佳榮教授在〈大時代的證言——陳君葆及其日記（1933-1949）〉一文中有以下一段話：

說句老實話，我對於曾經長期擔任馮平山圖書館館長的陳君葆先生，所知實在很少，更沒有留意他為香港以至中國的文教事業作過甚麼貢獻。直至1999年初，我在商務印書館與胡從經先生閒談，才知道世間上竟有陳君葆日記的存在，並保留了大量我夢寐以求（不過連自己都以為不可能會有）的記錄。¹

據知，陳君葆長期有寫日記的習慣，開始於1920年代，以訖於1980年代初。他用來寫日記的日記簿多達一百冊，日記文字估計超過一千萬字。² 1999年，經整理後的《陳君葆日記》共兩冊，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始於1933年，止於1949年。直至2004年，一共七卷的《陳君葆日記全集》才正式面世，亦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始自1932年，止於1982年。這套日記全面地展示出香港從193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的面貌，真實地記錄了這數十年間，香港在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變遷，因此，它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本文主要討論《陳君葆日記全集》中經常出現的一位人物——「老楊」。據日記整理者的註釋，這位「老楊」就是曾任香港民生書院院長的楊士端。可是，經筆者翻檢日記在不同時間的記錄，這位「老楊」卻是另有其人。

陳君葆其人其事

陳君葆（1898-1982），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三鄉鎮平嵐鄉，號水雲樓主，著作有《水雲樓詩草》、《陳君葆詩文集》及《陳君葆日記全集》等，文章則散見於《華字日報》、《華僑日報》、《大公報》、《文匯報》等報刊。他11歲時隨祖父移居香港，就讀於皇仁書院，後來考進香港大學文學院。大學畢業後，他前往新加坡華僑中學任教，後來出任馬來西亞七州視學官。1931年9月，他從馬來西亞回到香港，1934年受聘於母校香港大學，1936年正式接任馮平山圖書館館長兼文學院教席。

在香港大學任職期間，陳君葆與許地山、馬鑑等著名學者，共同參與本地的社會活動，例如推動平民教育、普及市民大眾的文化知識。1937年7月7日，中國抗戰軍興，陳君葆積極參與宣傳抗日的活動。1941年2月，陳君葆更協助宋慶齡在香港籌組「保衛中國同盟」，以支援中國的抗戰大業。1941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陳君葆不但克盡己職，使馮平山圖書館內的藏書保存完好，避過被日軍查抄或燒燬的命運，並將在中環郵政局內貯存的一批政府檔案文件，例如生死註冊處的簿冊、高等法院的文件等，轉移至香港大學圖書館收藏起來。³ 同時，他更收集了一大批重要資料和書籍。為此，英女皇於1947年頒授他O.B.E勳銜，以表揚陳君葆在戰時保護文獻的貢獻。

二戰結束後，陳君葆仍積極參與本地的社會活動。在馬鑑和陳君葆的鼓勵和幫助下，香港大學學生草擬了會章一分給校方，最終，當時的副校長施樂詩接見了學生，並同意中文學會復會。陳君葆先後擔任中文學會復會後第二屆（1948-1949）內閣副主席及第三屆（1949-1950）內閣、第四屆（1950-1951）內閣及第五屆內閣

(1951-1952) 主席。他於1957年擔任香島中學校董會名譽董事，後來出任華人革新協會第四至二十八屆副主席、第二十九至三十一屆主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君葆先後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委員、全國文聯委員、廣東省文聯委員等。1950年代，陳君葆更先後三次率領香港的青年學生及香港大學的英籍教授訪問北京，並兩次獲得當時的周恩來總理接見。

「老楊」之辨

在《陳君葆日記全集》中，特別是1932至1940的八年間，陳君葆經常提及一位叫「老楊」的朋友。

他在日記中首次提及這位老楊，是1933年元旦的一段記載：

〔1933年1月1日星期日〕這是一本日本人印行的日記。在這抵貨呼聲最高的當兒，老楊竟然拿這本東西送給我，而我又一點不遲疑地接受了它（十一月三日的事），也許有人說我們不愛國了。⁴

究竟這位老楊是甚麼人呢？根據香港商務印書館整理出版的七卷本《陳君葆日記全集》，整理者在上述記載提及老楊後加入一個註釋，指這裏的老楊就是曾任香港民生書院院長的楊士端。這個註釋無疑告訴讀者在日記中凡提及老楊的，均指楊士端。但整理者在1942年2月11日楊士端再次出現在日記時，又在楊士端後加入一個註釋，詳細介紹楊士端的生平。⁵ 究竟兩人是同一人，還是另有其人呢？

筆者認為日記整理者將老楊理解為楊士端是錯誤的。試細心閱讀以下兩段在時間上相連的記載：

〔1933年1月2日星期一〕老楊在香港似乎找不到可以談話的人，他極厭惡在這殖民地長大的華人，關於這點我

極表同情。老楊帶了兩位朋友來介紹互相認識，吳涵真又名亦生，和沈東璧。他們看過戲之後大家又談了好些時候才別去。涵真並拿出他的近作——刊在工商特刊「罵」的一篇，示給我們讀。他的文倒平平無奇只他的人倒很喜歡談論，有意味。他說目今中國是缺乏具有人格的人，所以總是弄不好，這很有見地。⁶

〔1933年1月3日星期二〕昨天對吳楊兩君講過：中國究竟會不會亡這問題。現在實沒有去討論的必要。我們現在所要的是：即使中國明天便亡，也須去幹，拼命去幹。關於用甚麼方法去救這危亡的中國一層，涵真是主張用緩性的方法，以教育為基礎，炳吉主張要用急激的方法，便是暗殺也可以採用。⁷

我們將上述三段在時間上相連的記載放在一起解讀，就清楚看到陳君葆提及的老楊是楊炳吉，並非楊士端。楊炳吉就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的第一任經理。1933年1月20日星期五：「午到中華書局棣熙已上任了，我只怕他心志太高，不肯耐苦勞，致不能久於其任，則我又覺無以對老楊。」⁸ 1933年7月22日星期六：「好幾天沒有和老楊見面，今天去訪他，抬頭看他寫字桌壁上掛的『商務』送來的一幀開張頌詞是『同舟之利』四個字，……」⁹ 從「商務」、「同舟之利」的字眼，這幀頌詞可能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所送贈的，而所謂「開張頌詞」所指似為中華書局香港分廠落成一事。楊炳吉在港廠竣工後，便調任港廠司理，所以此處的老楊為楊炳吉當無誤。1933年10月16日星期一：「到中華書局那裏去談天剛巧老楊也在，因向索取書櫥裏的銅佛與瓷道士，我本意不過是開玩笑的，實無意奪人之所好，但楊竟慷慨地着我拈去，我也只得領情了。」¹⁰ 相信此人就是楊炳吉。另外，又有一段記載證明陳君葆是稱呼楊炳吉為老楊的，1935年10

月19日星期六記載：「午間到陶陶仙館吃點心，炳吉談起汪精衛的『沉着與沉悶』來。我說『這話的意思是對的，但以他的地位來講，汪是不配說這話的。弄成現在沉悶的局面是政府，叫大家不能夠沉着也沉着不來也是政府，汪還能夠配說這話呢』？這話提醒了老楊了。」¹¹ 可見老楊就是陳君葆對楊炳吉的稱呼。

事實上，陳君葆在日記中曾提及認識兩位楊姓的朋友。1937年12月29日星期三：「和健廬兩楊在思豪吃點心，炳吉說這次中日戰爭，……」¹² 這處的兩楊一位應為楊炳吉，另一位可能是楊士端。我們回顧1933年2月2日星期四的記載，陳君葆便告訴我們從一位楊姓友人認識到另一位楊姓友人，且看以下一段記載：

老楊一點打完電話來叫我如果有空到中華去兩三分鐘。剛登樓他介紹那位久想認識的另一位老楊。¹³

陳君葆在這日的記載，清楚告訴我們他認識的兩位楊姓友人：一位在這年2月2日前經已認識，另一位是2月2日當天才認識。這兩人極有可能就是楊炳吉及楊士端。究竟陳君葆當天才認識的是哪一位呢？筆者認為陳君葆當天才認識的應該是楊士端。首先，根據前面的分析，其中一位老楊是港局經理楊炳吉，所以當天打電話給陳君葆吩咐他前往中華書局的，應該就是楊炳吉。其次，根據陳君葆在1932年底的日記，他早在1932年已跟楊炳吉認識，且看以下一段記載：

〔1932年12月15日星期四〕「凡是詩人都愛貓」這大概是莫泊桑說的罷；我和炳劫〔吉〕在Boston喝茶的當兒看見一頭銀灰色的貓跑出來，禁不住滿口稱羨，我很自然地問侍者：這是公是母，侍者不即答卻嗤的一聲笑起來，引得那個弄咖啡的和堂內對桌幾個女子都一齊笑起來，我才莫名其妙！究竟大家笑的甚麼？炳劫也跟着笑。¹⁴

筆者在前文已經指出，陳君葆在日記中對楊炳吉有許多不同的稱呼，部份相信是手文之誤，「炳劫」便是其中之一。¹⁵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陳君葆在1933年以前便已認識楊炳吉了。也就是說，他在1933年2月2日在港局認識的老楊就是楊士端了。

事實上，陳君葆的日記在1933年以前並沒有出現楊士端這個名字，但從1934年7月15日開始，日記中便十分頻繁地出現「士端」、「楊士端」的名字，而且其稱呼顯得十分有規則性，往往將老楊、楊士端的稱呼清楚分開。例如1934年9月27日星期四：「昨天老楊對我講，說士端有一種刊物託他轉交給我，但他爲了某種緣故不便帶來，要我親自去拿，同時寶彝也說他自己也不方便放在身邊，所以還是我自己去走一遭爲妙。」這段記載也說出老楊（楊炳吉）跟楊士端是認識的，進一步證明上述陳君葆在港局認識的老楊，就是楊士端了。陳君葆對他們稱呼的分別，除了避免混亂以外，似乎也透露出他對兩人交情深淺的一個說明。另一方面，這段記載很令人摸不着頭腦，是甚麼東西令他們如此不安呢？但只要稍稍了解楊士端的背景便可略知一二。其實楊士端是一位左派人士，甚至可能跟中國共產黨有某種聯繫。例如他曾介紹一位左派作家陳琪給陳君葆認識。我們再翻閱1942年的日記，在2月1日曾提及楊士端，整理者在此加入一個註釋，介紹楊士端的生平。原來楊士端在二十年代曾擔任陳獨秀的粵語翻譯；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與中共失去組織聯絡，後移居香港從事教育工作。這個註釋其實應該放在1933年楊士端剛在日記中出現的時候，但我們要到1942年的日記才清楚知道楊士端的身份與背景。因此楊士端交給陳君葆的東西，極有可能在當時來說是一些「反動」的資料，所以楊炳吉等人才這麼避忌。

結論

綜合以上的討論，筆者認為陳君葆在日記中提及的老楊應為港局經理楊炳吉，並非楊士端。而陳君葆大概是在1933年初透過楊炳吉的介紹才認識楊士端的。

註釋

- ¹ 周佳榮，〈大時代的證言——陳君葆及其日記（1933-1949）〉，載《陳君葆日記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卷1，頁vi。（以下簡稱《日記》）
- ² 周佳榮，〈大時代的證言——陳君葆及其日記（1933-1949）〉，頁vii。
- ³ 小思，〈一段護書往事——記陳君葆先生〉，載《陳君葆日記全集》，卷7，頁624-625。陳雲玉，〈爸爸陳君葆的一生〉，載謝榮滾主編，《陳君葆詩文集》（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2。
- ⁴ 《日記》，卷1，頁29。
- ⁵ 《日記》，卷2，頁56。
- ⁶ 《日記》，卷1，頁29。
- ⁷ 《日記》，卷1，頁30。
- ⁸ 《日記》，卷1，頁32。
- ⁹ 《日記》，卷1，頁49。
- ¹⁰ 《日記》，卷1，頁56。
- ¹¹ 《日記》，卷1，頁198。
- ¹² 《日記》，卷1，頁355。
- ¹³ 《日記》，卷1，頁34。
- ¹⁴ 《日記》，卷1，頁26。
- ¹⁵ 陳君葆在日記中經常有手文之誤的情況發生。例如將高文鐸寫成「高民鐸」、健廬寫成「健老」、陸費伯鴻寫成「陸貴伯鴻」、犬養毅寫成「太養毅」等。
- ¹⁶ 《日記》，卷1，頁117。
- ¹⁷ 《日記》，卷1，頁463。香港萬里書店創辦人同樣叫陳琪，於1959年與其他友人創辦萬里書店，未知即是否為日記中提及的陳琪，待考。參見《半世紀風雲：專訪香港書業翹楚》（香港：世界出版社，2004），頁197。
- ¹⁸ 《日記》，卷2，頁56。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主辦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合辦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講座系列

第四十一講

主講：

蘇利文教授（Prof. Michael Sullivan）

牛津大學凱瑟琳學院榮退院士

第四十二講

主講：

郭靜雲教授

俄羅斯國家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山大學歷史系候任教授

Some Reflections on Art and History

日期：2007年5月26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7:00-9:30

地點：中山大學永芳堂二樓講學廳

由考古資料探討神龍信仰

日期：2007年7月23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4:00-6:00

地點：中山大學永芳堂三樓講學廳

一則有關鴉片戰爭的廣東地方文獻 ——凌府墓志碑考

閔曉青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4年，廣州市在進行第四次文物普查中，於黃埔區長洲島灣螺岡凌庚堂墓，發現了一塊凌府墓志碑。墓志為碑狀豎立，蓋頂之石為廡殿頂狀，兩側青石夾護，下為石基座支承。墓志碑高95厘米，寬59厘米。題名和正文均為楷書，志

額為「凌府墓志碑」，正文29行，滿行54字，字寬、高約1.5厘米，保存完好，文字清晰可辨。志文由簡琬琳撰，黎崇基書，碑立於同治八年（1869）。全文錄如下，標點為筆者所加：

凌府墓志碑

賜進士出身例授武德騎尉晉授昭武都尉特授碭州營都閫府歷任吳川營都閫府海門營平海營參府廣堂凌表伯老先生大人暨德配梁太恭人墓志銘

豪傑各有樹立，而勳業既就，若不見其經營之迹者，無他，神有餘也，此其故嘗于廣堂凌公見之。公諱廷颺，字平波，小字秀滄，號廣堂，世居番禺金鼎鄉。始祖諱震，宋淳祐甲辰進士，任廣東制置使，經略大夫。公其二十一傳孫也。高祖諱柏，碩德遐齡，同堂五代，欽賜「七葉衍祥」扁額。曾祖諱德英，乾隆乙酉舉人，事父篤孝，時人稱為凌孝子，以五代同堂，一家再見，欽賜「七葉重光」扁額。家慶國恩，駢臻疊錫，識者知其福之未艾焉。祖昌蕃，邑武學生。父鳳翔，乾隆甲寅恩科武舉。而公與叔祖昌朝、胞兄一桂皆武進士，故時人稱為一門三進士，六代兩同堂云。公生而岐嶷，既長，猿臂善射，武力過人，年十七進邑武生，二十三中道光壬午科武舉，癸未，聯捷成進士，欽點以衛守備用。緣在部呈請分發本省效力，道光十年，歸廣州協右營收標，曆署把總，旋改署千總。營政捕務，坐理裕如，而大吏之知公者，莫不干城倚之矣。于時經任積勞，理得升轉，嗣因遵例，呈請改發外海水師效力，歸標學習，例限一年，故超擢尚需時日。方公之初至水師也，常帶兵船出洋外巡哨，一日，遇暴風猝發，舟人下碇，索立斷，惟舟尾大纜未遽絕，時風勢益烈，巨波拍天，兵丁皆股慄無人色，而公夷然晏坐，面不改容，風既定，顧船尾碇纜，乃有長蛇緣于斷處，若續然者，此非守固神完，自信有素，而能履險不驚如是耶？試用期滿，總督鄧以公年力正強，水師熟習，給咨送部引見。奉旨：准以外海都司補用，欽此。道光十九年，水師提督關委公劄兵九龍尖沙嘴驅逐夷船。回營後，復委公駐守靖遠炮台。二十年，總督林委公署理吳川營都司，旋委公帶吳、碭二營兵丁馳赴虎門防堵。既水師提督吳諭公兼帶陽江左、右、廣海三營弁兵。當是時，職寄專城，任膺分閫，陶侃則統率外援，張遼則獨當一面，官守奔命，羽檄交馳，而公則勝任而愉快。蓋公之因應者才也，而公之鎮定者心也。廿二年，總督祁委公署理海門營參將事，旋具疏題奏，補授碭州營都司，仍署海門參將。廿四年，調署平海營參將。公所到之處，兵民安堵，雞犬弗驚。每當解任，無不謳歌送之者。廿六年，宗室閣督者檄委改署海安營游擊，公乃離巡歸鄉，避讒不赴任。蓋公出處之際，公之神已審決之矣。公修眉廣額，軀幹偉長，性疏朗，不問家人生產，講武之暇，但以鑒史自娛，時或寄情吟詠。每履任，喜與賢士大夫游至吳川，如林芾南殿撰輩皆常同酬唱。晚節杜門不出，家居訓子，與兄雁序相隨，林泉共樂，怡怡如也。德配梁恭人，孝睦慈祥，幽閒淑善，雖盛怒，無疾言

遽色，家人無不服其教者，公筮仕後，一家之政，恭人皆身任之，故公雖勤勞于外而無內顧憂，皆恭人之力也。咸豐乙卯年，先公而卒，葬于鄉萬竹山。長子捷元援例入監，應武舉不第，後遂絕意名場，篤修內行，自奉廉儉，居母喪，哀毀過節，得疾亦先公卒，葬於恭人墓側。次子嘉藻，公兄撫以為嗣。長女適麻湧蕭姓，此皆恭人所出。妾譚氏，生祖賢、四女。妾陳氏，生祖耀、祖能、祖遜、祖達。公于同治丁卯卒于家，壽七十。長子所生嫡孫應辰及眾子奉柩合葬於恭人墓左，遵遺命也。今冬石墓告成，而予與嘉藻兄稱莫逆好，因屬予為志。予忝在戚誼，又公與先君子交最厚，故能熟悉生平，而知公所表見，皆其神之優於運量者，因為敘其世系，書其年月，次其事實，而總而銘之，其辭曰：

桓桓經略 建節斯土 保世滋大 科名接武 明德之後 乃有達人
凝承甲第 矯矯虎臣 萬里赴覲 矢恭矢慎 帝曰俞哉 專閫可信
烽傳海嶠 旆出高涼 鯨波妖靖 虎旅威揚 培植孔厚 多壽多男
丕烈祇承 桂蘭挺秀 畢墟夜動 從征蚩尤 自此何世 蓋偃松楸
水流山峙 環繞佳城 八世福澤 俊哲代生

郡庠生通家愚表侄簡珣琳頓首拜撰

賜進士出身覃恩敕授文林郎前雲南麗江縣知縣歷任晉甯州知州邱北縣知縣事充丙午科同考試官雷州府教授加三級年姻家眷弟黎崇基頓首拜書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立

(一)

志文云「始祖諱震，宋淳祐甲辰進士，任廣東制置使，經略大夫。公其二十一傳孫也。」凌震，宋末抗元名將，《宋史》、《元史》均無傳，其事迹散見於《宋史》、明朝黃佐《廣州人物傳》、黃淳等撰《厓山志》、清朝畢沅《續資治通鑒》、阮元《廣東通志》等書，雖然支離不全，但多言其兵敗而降，其中較詳且有代表者為《元史》卷129〈李恒傳〉所載：

（至元）十五年（1278）……以恒為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之。恒進兵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廣州。凌震等復抵廣州，恒擊敗之，皆棄舟走，赴水死，奪其船三百艘……又破其餘軍於茭塘。越十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厓山……衛王赴海死……其大將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

元人脫脫等所編的《宋史》，沒有凌震降元之語，僅講其敗於廣州茭塘，並未言其終。明初

宋濂、王禕主修的《元史》，方稱其解甲降。但上面所引李恒傳，既說凌震等被李恒擊敗，「皆棄舟走，赴水死」，又講凌震於崖山宋元決戰時「解甲降」，自相矛盾，已有人指出此訛誤。¹

志文稱「而公與叔祖昌朝、胞兄一桂皆武進士，故時人稱為一門三進士」。有關凌昌朝、凌一桂的事跡不詳，同治《番禺縣志》記載：

乾隆朝，武進士凌昌期，五十八年癸丑科；武舉人凌昌期，進士，五十三年戊申科；武舉人凌一桂，進士弟廷颺，二十四年己卯科；道光朝，武進士凌廷颺，平海營參將三年癸未科，進士二年壬午科。

今黃埔長洲島深井，舊屬番禺，凌廷颺之前，凌氏僅有此三人中武進士，所以墓志稱「一門三進士」。但縣志上所載為「昌期」，或是形近造成誤寫，應以墓志所載「昌朝」為準，以此可糾縣志之誤。武舉人，歷來為人所輕，重文輕武的觀念遍及南北，尤以江浙地區為甚，故魏源在道光年間說：「國家以提督主武，提學主文。提學使

者按行各郡，例兼試武童生。而江南之蘇、松、太倉，浙江之杭、嘉、湖，應試武童每不及額，文試則每邑千百。以貴文賤武之俗……」²而凌氏一門三進士，究其原因，概因道光年間海外貿易頻繁，粵海關於黃埔設有分口，西風東漸，儒家思想相對較為淡薄，故凌氏一門三進士現象不足為怪。

墓志稱凌廷颺於道光癸未三年（1823）成武進士後，在廣州協右營曆署把總、千總，得送部引見，以外海都司補用；廿二年，署海門營參將，補授礮州營都司，廿六年，因被改署海安營游擊，故離巡歸鄉。

清代八旗兵從龍入關後，半部駐於京師，為禁旅，另半部分鎮各省，為駐防，總數約為二十萬，故主體兵以綠營為主。據魏源稱，有六十六萬一千六百餘人。³綠營職官之制，在《清史稿》卷117〈職官志〉裏有載：

提督軍務總兵官從一品……聽于總督。鎮守總兵官正二品，掌一鎮軍政……聽于提督。副將從二品……參將正三品，游擊初制正三品，順治十年改從。掌防汛軍政……都司康熙二十四年定正四品……守備康熙三十四年定正五品……千總初制正六品……把總正七品，外委把總正九品。

為了對凌廷颺的任職遷徙、升降有明晰的瞭解，根據以上職官志所載，結合《選舉志·封蔭》，可列表以明確其時職官、品秩關係：

| 官職 | 品階 | 武階 |
|------|-----|------|
| 提督 | 從一品 | 振威將軍 |
| 總兵 | 正二品 | 武顯將軍 |
| 副將 | 從二品 | 武功將軍 |
| 參將 | 正三品 | 武義都尉 |
| 游擊 | 從三品 | 武翼都尉 |
| 都司 | 正四品 | 昭武都尉 |
| 守備 | 正五品 | 武德騎尉 |
| 千總 | 正六品 | 武略騎尉 |
| 把總 | 正七品 | 武信騎尉 |
| 外委把總 | 正九品 | 修武校尉 |

凌廷颺初署把總之職，非實授，僅為暫任、代理。得到兩廣總督鄧廷楨「給咨送部引見」，方得旨以「外海都司補用」。故銘辭曰「萬里赴覲，矢恭矢慎，帝曰俞哉，專閩可信」。由千總而越守備一職，得都司補用，應是超擢。「外海」者，相對於內河而言，並非地名，因凌廷颺供職於水師，來往於沿海一帶，故有此稱。

道光二十四年（1844），凌廷颺署平海營參將，二十六年，兩廣總督耆英改其署海安營游擊，他即行歸鄉。其中一個原因乃降職之故，由正三品的參將降為從三品的游擊。當然，也不排除其他原因，因墓志言「避讒不赴任」。據位於廣州黃埔長洲深井叢桂西街1號的凌氏宗祠內的《篤惠堂重建碑記》，上有「癸未科進士，平海營參將凌廷颺助銀二百五拾員」的記載，即凌廷颺自稱為參將，《番禺縣志》亦據而記載。但署並非實授，應以其實授官職為稱。與凌廷颺同時期於虎門、烏湧戰役犧牲的劉大忠、麥廷章、祥福三人的有關情況足以說明。

查廣東海口營參將奏補香山協副將劉大忠、碣石鎮標右營都司奏署廣東水師提標左營游擊麥廷章、經該督奏請升補升署，尚未送部引見，並未給札；湖南鎮算鎮總兵祥福，經該督奏請委署湖南提督印務，旋即赴粵，均應仍照原銜議恤。……欽奉諭旨，……署湖南提督鎮算鎮總兵祥福仍照總兵例恤銀七百兩……請補廣東香山協副將海口營參將劉大忠仍照參將例恤銀五百兩，奏署廣東水師提標左營游擊、碣石鎮標右營都司麥廷章，仍照都司例恤銀三百五十兩……⁴

以上說明參將劉大忠不按副將、都司麥廷章不按游擊、總兵祥福不按提督的級別給予恤銀，原因就是三人均為奏請升補、升署、委署，尚未正式委授，只能按原銜議恤。以此類推，說明凌廷颺實際上的職官為都司。

終其一生，凌廷颺實授之職應為礮州營都

司，所任海門營參將、平海營參將均為「署」而已，所以墓志稱「例授武德騎尉晉授昭武都尉」，此二職為武散階，武德騎尉為正五品，實職為守備，昭武都尉為正四品，對應的實職為都司。若參將為實授，其墓志應當列明對應正三品的武散階武義都尉，墓志未列，正好說明此職僅為「署」，非實授。

(二)

墓志稱「道光十九年，水師提督關委公剖兵九龍、尖沙嘴驅逐夷船。回營後，復委公駐守靖遠炮台。」自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林則徐於虎門燒毀鴉片開始，中英對抗已升級。林則徐下令斷絕英人在澳門的日用品，派兵進駐香山，勒令英人離開澳門，義律帶英人停船於香港、九龍處。據林則徐「批澳門廳義律呈訴吐密三板至九龍被炮攻擊由：七月二十七日，該夷大小船十餘隻，向九龍駐守之師船，以索食為由，乘人不覺，先行開炮，傷及官兵，該師船自不能不放炮回擊。」⁵這次交戰，戰果為「擊翻夷船，轟斃夷匪多名，復經守備黃琮拋擲火藥，焚毀夷船。」⁶據墓志，當時水師提督關天培委任凌廷颺紮兵於九龍，參與了驅逐由澳門撤出的英夷船一事。驅逐、交戰非此一回，此後，「（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聞英夷兵船在龍穴向關提軍遞稟未收，開炮來攻，經提軍抵禦……始行遁去。」「（十月初七日）午後制軍（指鄧廷楨）來，皆會商尖沙嘴剿堵事宜也」⁷可見驅逐、交戰遷延數月。

墓志謂凌廷颺回營後，駐守靖遠炮台。靖遠炮台，是為加強虎門防禦能力而新建的炮台，為「當時清朝疆域內構築最堅固、火力最強大的炮台。」⁸「台內安配炮六十八位，八千斤鐵炮二十五位，六千斤鐵炮六位，五千斤鐵炮十位，四千斤鐵炮二十七位。」⁹靖遠炮台是關天培駐守指揮之地，林則徐在道光十九年十月初九日的日記中寫到：「晨起，偕鄧制軍赴橫檔，靖遠炮台……提軍（指關天培）所住炮台，乃今年新建者，靖遠居中，左曰威遠，右曰鎮遠，共有大炮百數十位，勢甚雄壯。」據《清史稿·兵志》，

廣東水師提督自統轄前、後、中、左、右五營提標，凌廷颺被關天培委以駐守其所住之主炮台，居中而守，於此可見凌廷颺的能力及受器重程度。

(三)

此墓志涉及不少歷史人物，可與史籍互相補充、印證。

墓志稱「試用期滿，總督鄧以公年力正強，水師熟習，給咨送部引見。……道光十九年……」由此知總督鄧任職於道光十九年之前，據《清史列傳》卷38鄧廷楨：「（道光十五年）八月，擢兩廣總督……（十九年）十二月，調兩江總督。」說明鄧應為鄧廷楨。

墓志稱「道光十九年，水師提督關委公剖兵九龍、尖沙嘴驅逐夷船。」《清史稿》卷32關天培：「（道光）十四年，授廣東水師提督……二十一年正月，敵進攻，守台兵僅數百……天培已殞絕于地」可知水師提督關是指關天培。

墓志道「（道光）二十年，總督林委公署理吳川營都司。」《清史列傳》卷38林則徐：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命頒欽差大臣關防，馳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十二月，調兩廣總督……二十一年三月，賞四品卿銜，命赴浙江。

總督林是指林則徐則無疑。

墓志道「（道光）二十年，……既水師提督吳諭公兼帶陽江左、右、廣海三營弁兵」二十一年正月，水師提督關天培陣亡，水師提督吳即為接任者。《清實錄廣東史料》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三月己丑：「以福建海壇鎮總兵官吳健勳，為廣東水師提督。」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初四的林則徐日記「聞水師提督缺改放吳健勳（福建海壇鎮升此）。」以上均說明吳乃吳健勳。

墓志稱「（道光）廿二年，總督祁委公署理海門營參將事。」時接任總督之任者當為祁埭。在《清代碑傳全集·續碑傳集》卷23，〈太子少

保兩廣總督高平祁恭恪公墓志銘》中有載：

公諱埜，……（道光）二十年，逆夷犯廣州，明年正月，大兵會剿，公奉命往辦糧台事務，塗次改授兩廣總督，……又越三年，公不還矣。

墓志云「（道光）廿六年，宗室閣督耆檄委改署海安營游擊，公乃離巡歸鄉，避讒不赴任。」這位宗室閣督耆，當指耆英。因耆英為清人宗室，又曾為文淵閣大學士、兩廣總督，故有「宗室閣督」之稱。據《清史稿》〈耆英傳〉：

宗室耆英，字介春，隸正藍旗。……（道光）二十三年，授欽差大臣，赴廣東議通商章程。……二十四年，調授兩廣總督。」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命協辦大學士、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來京陛見。以廣東巡撫徐廣縉署欽差大臣兩廣總督。¹⁰

墓志稱「每履任，喜與賢士大夫游至吳川，如林芾南殿撰輩皆常同酬唱。」林芾南即廣東狀元林召棠，其例授翰林院編修，所以有殿撰之稱。據《廣東文徵》載：

林召棠，字愛封，號芾南，吳川人。道光癸未一甲第一名進士，授修撰。辛卯，典陝甘省試，尋引疾歸，主講端溪書院以終。召棠工書能文，而性耽禪悅，其自輓有問今安往，本未嘗來語，可謂徹底透悟。

可知林召棠雖於科舉已達人極，但「性耽禪悅」，而凌氏平時亦鑿史自娛，或寄情吟詠，故能兩相酬唱。

（四）

墓志稱凌廷颺道光三年（1823）中武舉，第二年即「聯捷成進士」，因呈請在本省效力，故

自道光十年（1830）始，至廿六年（1846）離巡歸鄉止，十六年均在「外海」任職，即廣東沿海一帶任職。

墓志道「二十年，總督林委公署理吳川營都司，旋委公帶吳、礮二營兵丁馳赴虎門防堵。」吳川，地處粵西，清代隸屬高州府，吳川之南即為礮洲。「吳川縣，東北至高州府百三十里，漢高源縣地，隋置吳川縣，屬高州府……礮洲在縣南大海中，宋置礮洲寨，後為翔龍縣……縣南四十里，有廣州灣，海寇出沒處也，向設兵戍守。」¹¹礮洲之礮，又作礮。明朝黃淳等撰《厓山志》云：

礮洲，景炎帝欲往佔城，不可，遂駐礮洲。在吳川縣南二百里外，屹立鉅海中，當南北孔道，乃雷、化二州之交。亦名礮川，闊數百里，有三十六村。宋亡後，元大德中，建塔其上。

正因為礮洲島處於廣州至廉州、海南之海道上，故清朝光緒年間，中法戰爭爆發，也將此地列為軍事要塞。因而「礮洲，〔所屬縣營〕屬高州府吳川縣陽江礮洲營管轄……〔形勢〕礮洲孤懸海中，為省城往來廉瓊要道……〔綠營〕額設駐防礮洲都司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兵九十四名。」¹²

墓志謂「既水師提督吳諭公兼帶陽江左、右、廣海三營弁兵。」陽江在清朝為直隸州，管轄兩個縣，南邊即為海，在軍事上則屬高州鎮節制。「高州鎮，水師兼陸路總兵。統轄鎮標二營，兼轄羅定協、陽江等營。」¹³廣海位於陽江之東，在清朝隸屬新寧，即今台山地區。「新寧，廣海寨，縣丞駐。」¹⁴

墓志稱「廿二年，總督祁委公署理海門營參將事。」海門，位於潮陽縣境內，凌廷颺由粵西、粵中又調到粵東任職。「潮陽縣，海：磊口，海洋之門也，其外為牛田洋，澄、揭之水皆匯於此，有海門所，為扼要處。嘉靖三十八年，倭敗自福建漳州來犯，自磊門登陸，攻海門所，官軍擊敗之是也。」¹⁵據同治年間記載：

海防門戶有海門所域，海門所市有新
 蒼，南濱大海……海門水師營參將一
 員，駐海門所城，隸南澳鎮。」¹⁶

說明海門一直被視為海防要地。

墓志曰「廿四年，調署平海營參將。」平海
 山，在廣東惠陽縣東南二百里，下設戍衛之所，
 《讀史方輿紀要》載：「惠州府，碣石衛……平
 海守禦千戶所，在府東二百里，俱洪武二十七年
 置，隸碣石衛。」¹⁷ 凌廷颺在其位於廣州黃埔長洲
 深井叢桂西街1號的凌氏宗祠內的落款，署名為平
 海營參將，在此墓志前所署亦為平海營參將，可
 知他離任歸鄉前的署任官職為平海營參將。

墓志曰「廿六年，宗室閣督耆檄委改署海安
 營游擊。」海安，位於徐聞的最南端，面臨瓊州
 海峽，與海南島隔江相望。此為清初時的情況，
 後來，改屬瓊州鎮，「瓊州鎮水師兼陸路總兵，
 統轄鎮標二營，兼轄龍門協、雷州等營……海門
 營。」¹⁸ 海安營雖亦為外海，但處於粵西的西端，
 與凌廷颺原任的粵東惠州府平海營相去甚遠。這
 也是探討凌廷颺自行離任歸鄉的一個不可忽視的
 因素。

從凌廷颺任職的地域範圍，印證了魏源的
 觀點：「故平海賊必用閩、廣之將，而擊番、羌
 必資西北之兵，易地弗能為良，亦生材各種所
 獨。」¹⁹

結語

凌府墓志的發現，為我們研究第一次鴉片戰
 爭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墓志成文時間與墓主
 所逝時間相去不遠，且其活動時間橫跨第一次
 鴉片戰爭期間，活動區域亦多在廣東沿海防禦要
 塞，是整個鴉片戰爭廣東戰區的一位參與者和見
 證者，故史料價值頗高。此墓志對史志有一定的
 糾誤作用。墓主任職時間不長，官職為中下層，
 但墓志對其事迹記錄十分清晰，其中還涉及到不
 少重要的歷史人物，這為研究清代職官制度提供
 了鮮活的實例，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史料。

注釋

- ¹ 陳憲猷，〈宋廣東制置使凌震殉節補證〉，《東
 方文化》，1995年，第1期。
- ² 魏源撰，《聖武紀》（北京：中華書局，
 1984），卷14，〈武事餘記·議武五篇〉，頁
 548。
- ³ 魏源撰，《聖武紀》（北京：中華書局，
 1984），卷11，〈兵制兵餉〉，頁470。
- 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
 料》，第三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2），頁
 279-280。
- ⁵ 中國歷史研究所編，《信及錄》（上海：上海書
 店，1982），頁100。
- ⁶ 《清實錄廣東史料》，第四冊（廣東：廣東地圖
 出版社，1995），頁222。
- ⁷ 中山大學歷史系編，《林則徐集·日記》（中華
 書局，1984），頁358。
- ⁸ 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
 （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222。
- ⁹ 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
 料》（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442。
- ¹⁰ 《清實錄廣東史料》，第四冊，頁411。
- ¹¹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上海：上海書店出
 版社，1998年影印本），頁674。
- ¹² 張之洞奉敕撰，《廣東海圖說》，光緒十五年十
 月。
- ¹³ 《清史稿》，卷73，〈地理志〉，頁9310。
- ¹⁴ 《清史稿》，卷73，〈地理志〉，頁9109。
- ¹⁵ 《讀史方輿紀要》，卷130，〈廣東〉四，頁
 671。
- ¹⁶ 毛鴻賓、瑞麟等編，〈廣東圖志〉，同治五年，
 卷33，頁12-13。
- ¹⁷ 《讀史方輿紀要》，卷130，〈廣東〉四，頁
 670。
- ¹⁸ 《清史稿》，卷131，〈兵志〉，頁9310。
- ¹⁹ 魏源撰，《聖武紀》，卷14，〈武事餘記·議武
 五篇〉，頁546。

清代景德鎮的惜字會

——景德鎮寧紹惜字會碑介紹

劉朝暉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筆者於2004年6月30日對景德鎮進行古代瓷業調查時，在景德鎮陶瓷館大院內發現一塊新出土的咸豐元年寧紹惜字會碑刻。據介紹，此碑因市

政建設而剛出土不久，暫存於此。

碑刻全文如下，標點為筆者所加：

奉憲鐫碑

特調浮梁縣正堂加五級又議敘加三級隨帶紀錄二次謝 為

勒石示禁，以垂久遠事。據浙東甯紹眾商監生胡錦堂、沈良瑄、教諭裴亢宗、職員沈德崧、王□、王豐、陳和懋、孫春陽等稟稱，康熙二十五年，山陰磁商捐資糾集惜字會，建造三官殿，於般若庵左置早□（稻）田三十二畝三分二厘，糧立魚步都三圖尾甲。山陰惜字會戶輸納有年，並請庵僧撿拾字紙，歷年其□從無他弊。近因山陰乏商照管，致舊歲九月間僧妙峰等盜賣會田四畝。生等查知，具稟景德司主查追盜賣印契塗銷，另雇僧證祥住持。生等寧紹二幫設有會館，道光二十八年印刷勸惜字文，分送各戶，並雇工上街撿拾字紙、字磁。今三官殿年久傾圮，捐資重修一新。竊思山陰惜字會照料乏人，公議更戶，改立寧紹惜字會戶，註冊立案，仍在魚步都三圖尾甲輸糧，俾可兼顧。稟懇勒石示禁等□□□據此，除稟批示並飭架書、更立戶名納課外，合行示禁，為此示仰該會內各首事人等知悉，嗣後會田務須妥為照管，禁止僧人毋許圖財盜賣。該首等仍雇工逐日上街，分路撿拾字紙，使道□溝壑無片紙支字之遺，咸知敬惜，獲福無量。僧人如敢違抗不遵，復蹈前轍，許該首事赴縣具稟，以憑拘究，決不姑寬，其各凜遵，切切。特示。 右仰知悉。

咸豐元年閏八月十八日 告示

三官殿□立碑

這塊碑刻對於我們瞭解清代景德鎮的商幫、會館以及慈善活動，研究景德鎮社會史是極其難得的資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碑文中有關惜字會的內容，為我們研究其成立和組織結構提供了寶貴的佐證。

從碑文看，景德鎮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即出現了惜字會。對惜字會有深入研究的梁其姿先生認為「以惜字為由而組成的社或會最晚在康熙時已出現」¹，景德鎮山陰（紹興）瓷商所建的惜字會為此提供了一個新的證據。更值得重視的是，從創立的時間來看，它比梁先生列舉的江蘇吳縣周莊鎮，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由儒生改組的惜字社更早。從筆者收集的景德鎮資料來

看，這也是目前所知的景德鎮最早的惜字會。另外，以往所知的清代早期惜字會大多分佈在江南地區，這塊碑刻為我們提供了江西地區的個案，也促使我們思考惜字會這種組織的形式，如何從江南傳播到其他地區，以及商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經營瓷器的浙江山陰瓷商在景德鎮捐資創立了惜字會，同時建造了三官殿，並在般若庵旁邊購置了糧田三十二畝三分二厘作為會田。另外惜字會戶每年捐款輸納，使惜字會在經濟上獲得保障。惜字會雇用庵裏的僧人撿拾字紙，一直運營正常。但到了道光末年，因為山陰商人對惜字會缺少照管，致使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間部

分會田遭到僧人妙峰等人盜賣。甯紹商人胡錦堂等具稟景德鎮巡檢司予以追查，註銷了盜賣的契約，並另外雇傭僧人證祥負責管理會田。

此時，浙東的寧波、紹興二幫商人因為地緣相近，已在景德鎮設有共同的寧紹會館，並從道光二十八年（1848）起印刷勸惜字文，分送各戶，並雇工上街撿拾字紙、帶款字的瓷器。三官殿年久傾圮，寧紹會館又捐資進行重修。甯紹商人、同時又是監生的胡錦堂、沈良瑄、教諭裴亢宗、職員沈德崧、王□、王豐、陳和懋、孫春陽等以「山陰惜字會照料乏人」為由，向浮梁縣提出將其更戶為寧紹惜字會，獲得批准，並於咸豐元年（1851）勒石立碑。

除寧紹惜字會外，目前所知的還有清代婺源商人余席珍在景德鎮興辦的惜字會。余氏為婺源沱川人，具體的活動年月不詳。光緒《婺源縣誌》中記載余席珍為「邑庠生。……承先人遺業，服賈景鎮。其市廛五方雜處，客死者多。徽商會館向設義渡、義棺、義塚，貲竭難敷，珍集六邑紳士捐置田產。為長久計，並倡義瘞會，每歲雇工培土，澤及枯骸。興惜字會，建文昌宮，籌畫備極周詳」²。惜字會與文昌信仰有非常密切的關係³，所以余席珍在興辦惜字會的同時，還建立文昌宮。作為惜字組織，余氏所創的惜字會應有其他婺源或徽州商人的加入，也許是為徽州會館所支持。

從目前所見的文獻中看來，景德鎮的惜字會

均是商人創辦，並與地域商幫或會館有關。梁其姿先生在討論儒生與惜字信仰時提及「惜字會創始人純粹是儒生的這個情形也極為普遍」⁴，但景德鎮的情況似乎提出了反例。雖然寧紹惜字會碑刻中提到的盜商都有功名，婺源商人余席珍也是庠生，但我們無法確知最早在景德鎮創立惜字會的山陰盜商是否儒生出身？為什麼這些在景德鎮經營的商人會創辦惜字會，這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是儒生文化對這些原本讀書以求功名的商人的影響，亦或是以積善而得福獲利？「惜字為積善中大功課，功名之得失，子孫之賢肖，福祿之增減，多由於此」⁵。在寧紹惜字會的碑刻中有提到對字紙的「咸知敬惜，獲福無量」，莫非這就是商人們組織惜字會的動機，借此祈求經商順利？

注釋

¹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179。

² 吳鶚總纂，汪正元、李昭煒、張貴良纂修，光緒《婺源縣誌》，卷35，〈義行八 人物十〉，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³ 參見梁其姿先生的論證，見氏著《施善與教化》，頁190-191。

⁴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頁193。

⁵ 余治，〈得一錄〉，《惜字會分別緩急說》。轉引自梁其姿《施善與教化》，頁182。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合辦

歷史人類學研究生研討班（第十四期）

研討班每年舉辦二至三次，旨在為人文社會學科研究生提供互相交流的機會，鼓勵多學科整合的研究取向。

日期：2007年11月3-4日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一）論文報告人

資格：論文報告人必須為碩士或博士班最後一年學生，報告題目必須為本人學位論文。

報名辦法：

請於2007年10月5日前將報告提綱以電郵方式同時送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黃國信收

電郵地址：hsshgx@zsu.edu.cn與hshac@zsu.edu.cn；及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黃永豪收

電郵地址：schina@ust.hk

主辦機構將於10月19日前通知是否接納申請，並安排報告日期。

提綱需包括以下各項：

1.學位論文題目；2.有關課題的研究綜述；3.論文各章節簡介；4.參考書目。

費用：

論文報告人往返車費（火車硬臥或汽車）及會議舉行期間之食宿費用，由主辦機構負責。

（二）參加研討班討論

資格：碩士或博士各級研究生

報名辦法：

請於2007年10月19日前，將姓名、所屬學校、院、系、暫擬學位論文題目等資料電郵送hsshgx@zsu.edu.cn, hshac@zsu.edu.cn及schina@ust.hk。

費用：

歡迎各相關學科研究生參加討論，往返旅費由參加者自理，與會期間食宿費用由主辦機構負責。

《歷史人類學學刊》

第五卷第一期（2007年4月）

水利專號

- 利、害博弈與歷史恩怨——蕭山湘湖社會史的變遷軌跡（錢杭）
 爭奪水權、尋求證據——清至民國時期關中水利文獻的傳承與編造（鈔曉鴻）
 塘堰與灌溉：明清時期鄂南鄉村的水利組織與民間秩序——以崇陽縣《華陂堰簿》為中心的考察（楊國安）
 本地利益與全局話語——晚清、民國天門縣歷編水利案續解讀（周榮）
 近代洞庭湖區的湖田圍墾與水利糾紛——以沅江白水澗閘堤案為例（鄧永飛）

書評

- Engseng HO, *The Graves of Tarim: Genealogy and Mobilit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衛思韓）
 郭德焱，《清代廣州的巴斯商人》（周文娟 蔡香玉）
 Leo. K. SHIN.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唐立宗）
 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識形態研究》（謝曉輝）
 Steven B.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黎恩）
 周建新，《動蕩的圍龍屋——一個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與文化抗爭》（謝宏維）
 林拓，《文化地理過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陳瓊芝）
 James A. M ILLWARD, Ruth W. DUNNE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E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蔡偉傑）
 周大鳴，《鳳凰村的變遷：《華南的鄉村生活》的追蹤研究》（麻國慶）
 唐力行等著，《蘇州與徽州：16—20世紀兩地互動與社會變遷的比較研究》（卞利）

第四卷第二期（2006年10月）

專論

- 姓氏與祖先——雲南洱海地區階序社會的形成（連瑞枝）
 風華再現——清代福建社會風氣的變遷（徐泓）
 翠亨孫中山故居文物的社會史解讀（邱捷）
 漢語、苗涇浜、汶類——貴州苗人家譜的混聲與界線（簡美玲）
 真武神志：察哈爾鄉土傳統的流變（賀登崧 Willem A. Crootaers）

書評

-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趙世瑜）
 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陳賢波）
 Lynn A. STRUVE ed. *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杜正貞）
 Hui Kian KWE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va's Northeast Coast, c. 1740–1800: Elite Synergy*（張彬村）
 劉正剛，《東渡西進——清代閩粵移民臺灣與四川的比較》（溫春來）
 Joseph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黎恩）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Elisabeth KÖLL）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朱濤）
 王笛，《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孫琦）
 松浦章，《清代中國琉球貿易史の研究》（焦鵬）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劉志偉編纂《張聲和家族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所編文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東莞張聲和家族文書。張聲和(1853-1938)是廣東省東莞縣牛眠埔村人，曾長期任職於香港基督教巴色傳道會，在廣東紫金、東莞和香港等地傳教。本輯文書，主要是張聲和牧師在他的鄉下東莞牛眠埔村的財產關係文書，包括置產簿、分家書、田產買賣典當契約和借債文書等。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貞泰號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北部灣及其沿岸地區從事商業貿易的商號。本書收集貞泰號及其合伙商號的商業往來文書，包括貞泰號「1928年的股東名單」、「1928-1936年的會議紀錄簿」、代理合約一份、札單17張及商往來書信83件。亨泰號合同2份，年結1本及商業往來書信17件。欽州永壽號年結1本。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本輯文書收錄北海貞泰號年結簿32本，分別為1893，1903-1908，1910-1913，1915-1935年，依年份先後排列；並包括年結簿內夾附的記數紙條，各股東溢利銀及積利息的記錄。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收錄華人企業「乾泰隆」的商業文書，包括376件公司記賬紀錄，189件銀行及錢莊票據，283件商業契據，及各類機構的收據，包括土地物業稅收條、各種公共事業的收費記錄。全書共輯錄848件商業文件。

張小軍、余理民編著《福建村落碑銘》定價：港幣120元

杉洋位於閩東古田東部。本書為編者於1993-1996年間於杉洋進行田野研究時與當地村民余理民一同搜集的碑銘記錄。全書收錄各類記敘碑、祠堂碑、樂捐碑、旗杆石碑及300多塊現存的墓碑，共計碑文400多條。

宋怡明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研究資料彙編》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收錄宋怡明(Michael Szonyi)搜集有關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的資料。這些資料的來源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各類專家，如道士、說書者、演傀儡戲者所提供的資料；第二種是五帝信徒所提供的經文、教旨以及碑銘等資料；第三種是旁觀者描述五帝的資料，如地方官僚或西方傳教士所寫的文章。

廖迪生、盧惠玲編，鄧聖時輯《風水與文物：香港新界屈山鄧氏稔灣祖墓搬遷事件文獻彙編》定價：港幣100元

本書收錄鄧聖時所存自1993至2002年間有關香港新界屏山鄧氏宗族在稔灣之祖墓搬遷事件中各方面的來往信函、文件、資料和會議記錄。全書共輯錄文獻151條。

訂購表格

| 歷史人類學學刊 | 機構 | | | | 個人 | | | | 學生 | | | |
|---------|------|--|------|--|------|--|------|--|------|--|------|--|
| | US\$ | | HK\$ | | US\$ | | HK\$ | | US\$ | | HK\$ | |
| 一年共兩期 | 50 | | 350 | | 30 | | 220 | | 20 | | 150 | |
| 兩年共四期 | 100 | | 700 | | 60 | | 440 | | 40 | | 300 | |
| 叁年共六期 | 150 | | 1050 | | 90 | | 660 | | 60 | | 450 | |

請以 X 選出合適的項目。上述價格為折扣價，已包括平郵郵費。

開始訂閱期號：第_____卷第_____期

|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 定價 | 折扣價 | 訂購數目 | 合計 |
|----------------------------|---------|--------|------|------|
| 1. 劉志偉編《張聲和家族文書》 | HK\$80 | HK\$64 | 本 | HK\$ |
| 2.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 | HK\$80 | HK\$64 | 本 | HK\$ |
| 3.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 | HK\$120 | HK\$96 | 本 | HK\$ |
| 4.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 | HK\$120 | HK\$96 | 本 | HK\$ |
| 5. 張小軍、余理民編《福建杉洋村落碑銘》 | HK\$120 | HK\$96 | 本 | HK\$ |
| 6. 宋怡明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資料彙編》 | HK\$80 | HK\$64 | 本 | HK\$ |
| 7. 廖迪生、盧惠玲編《風水與文物》 | HK\$100 | HK\$80 | 本 | HK\$ |
| 小計 | | | 本 | HK\$ |
| (郵費 + 書價) 合計 | | | HK\$ | |

香港本地免郵費，海外訂購，每本另加港幣10元，作為平郵費用。

若以美元付款，請以HK\$7.5 = US\$1折算。

付款辦法：

附上支票/銀行本票* (US\$/HK\$) * _____，支付「香港科技大學」"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請圈出合適者)。

請在我的信用咭帳戶扣除US\$/HK\$ _____

我將以右列方式支付款項： VISA MASTER CARD

信用咭號碼 _____ 有效期至：_____

持咭人姓名：_____ 持咭人簽署：_____

請把書刊寄往：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傳真：_____ Email: _____

請寄回訂閱表格往：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 華南研究中心

編輯委員會啟事

在各界長期的支持和鼓勵下，本刊正進入出版的第十二年。本刊自第45期開始書號更改為ISSN:1990-9020。敬請各界踴躍投稿，批評指導，使我刊繼續向前發展。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_更改地址

_____新訂戶

姓名(Name) : _____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Institution) : _____

通訊地址(Mailing Address) : _____

電話(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E-mail) : _____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刊登，作者將獲贈該期十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來稿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審閱。
- (十)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永豪先生收

電郵：schina@ust.hk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轉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歐冬紅小姐收

電郵：hshac@mail.sysu.edu.cn